开头必须要说明，我未曾完整的读过《红楼梦》，更确切地说，我只是读过某些零碎的章节。但我确实未《红楼梦》的世界所吸引，期望会在将来有空闲的时候，仔细地从头读过。现在不妨读一读“红学”的研究，以管中窥豹。

本书是余英时有关《红楼梦》的文章集合，“我對《紅樓夢》只是發現一個問題， 解決了就完了，我並不是對這部小說迷得不得了。”确实如此，本文既是作者红学的起点，又是终点，言有未尽处，不妨视作与原书的呼应。

本书开头第一篇文字《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》是对“红学”研究的学术史回顾，我曾查询过今日的红学流派，不过不同地方的记载有一些差异，有往往有重合而混乱不清的地方，因此暂时仍以作者所标示的为基点。至20世纪70年代，红学已形成了四个流派：由胡适最先揭橥的“自传派”，也可称为“考据派”；认为全书主旨是“反清复明”的“索引派”；受大陆意识形态主导的“阶级斗争派”；以及作者所提倡的，当时尚未有得到充分重视的“新典范”，或可称之为“文学评论派”。

作者在提出自己的“新典范”前，特别用了不小的篇幅，来介绍库恩的“科学范式”理论，其中“技术崩溃”、“典范”概念尤其重要。引用库恩的《科学革命的结构》，既是为了借以说明红学旧方法的穷途末路，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作者广泛的阅读兴趣和知识的迁移能力。虽然库恩的理论已被后来者证明是具有解释上的局限性的（如生命科学、静力学），但在这里的应用则恰到好处。

关于前三种流派的局限性，以及其发展的“极限”，作者已做了详细的说明，这里不再赘言。倒是作者的比喻颇堪玩味，有分黑色幽默的意味：

“索引派”是要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来解决牛顿物理学所遭遇的困难；而“斗争论”则显然是想凭借着李森科的遗传学来推翻整个生物学的研究传统。

那么作者的“新典范”指的又是什么？其一，新典范强调《红楼梦》作为小说的文学性，特别是其中的理想性与虚构性，而非历史性（前三派都有此倾向）；其二，新典范假定作者的意图藏在小说的内在结构中，而不追求以外在的证据解释小说（前三派亦有此症）。

现在来看，作者所主张的“新典范”确实已经成为了足以和前三者分足鼎立，乃至隐隐有主导之姿的“红学”。只不过，材料的限制可能要远甚于方法论上的限制，今日的“红学”不免还是有各说各话、难以统一意见的问题在，这一点或许是“红学”既“严肃”又不那么“正经”的原因所在，看来作者的适时抽身，就红学来说，也真是再恰当不过。

《红楼梦的两个世界》原是作者在新亚书院的演讲，也是“正式”踏入“红学”研究的开始。本文不长，但颇具启发性，即使是我这样未通读过全书的读者也是读得饶有兴味。“两个世界”是对《红楼梦》主旨整体性地概括，其涵义甚广，包括“乌托邦”与“现实”，“清”与“浊”，“情”与“淫”，“假”与“真”，风月宝鉴的正面与反面等等。本文也是上文所提出的“新典范”红学的一次尝试。

作者讨论的起点也是宋淇《论大观园》一文的主要观点：大观园决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，而是作者为了迁就他的创造企图虚构出来的空中楼阁。作者就此，对《红楼梦》的关键概念做出了一系列判断，如“太虚幻境”即是大观园，大观园的理想世界是建立在“最肮脏”的现实世界上的，《红楼梦》的结局指向的是“干净的理想世界”回到肮脏的悲剧等。作者的论证过程，正如其在前文中所说的，完全依据的是书中的原文，特别是前后文之间的内在联系，理由充分，论据可靠。这一论证的过程真可谓是相当精彩。即使不报有先入为主的成见，我想我无疑是为作者所说服了的，“新典范”确然当为《红楼梦》研究最可取的态度。